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文库



#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 1927 - 1937 )

杜恂诚 ©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文库  
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 1927 - 1937 )

杜恂诚 ©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1927—1937/杜恂诚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6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文库)

ISBN 978-7-5642-2968-9/F·2968

I. ①中… II. ①杜… III. 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史-研究-中国-1927—1937 IV. ①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2113号

策 划 黄 磊 袁 敏

责任编辑 黄 荟

封面设计 张启帆

封面篆刻 林 健

##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1927—1937)

杜恂诚 著

---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369号 邮编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mailto: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装订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

710mm×1000mm 1/16 27.5印张(插页:2) 468千字  
定价:98.00元

#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文库

主 编

程霖

---

副主编

王昉

燕红忠

---

# 总 序

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也在外部冲击和内部调整之中发生了空前的转型变迁。本文库聚焦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力图全方位、多视角地解析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与发展脉络。对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思想演变及其内在逻辑规律的揭示，对于当下正处在新的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的涅槃和更生，无疑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与现实价值！

本文库以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作为主要研究基质，以问题导向性作为划分体例，分别以独立专著形式展开研究，选题内容广博丰富，聚焦于近代中国财政、金融、保险、城乡关系、农村地权、民族资本主义、家族企业变迁等各个方面，在详尽搜集各领域相关经济思想和经济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经济相关领域制度变迁和转型升级的经验及教训，有助于揭橥中国道路的近代历史渊源。

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观察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同样也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背景，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本土化，为此本文库也纳入了这方面的专著。

本文库是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成果之一，不仅较为全面、深刻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的重要研究成果，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可靠立足点，

同时基于对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提炼,有助于与现当代中国经济转型实践的逻辑连接,也有助于指导并预测中国经济转型的未来方向,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后发国家的转型发展提供具有可借鉴性和可推广性的中国智慧。

“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历史与思想研究文库”编委会

## 前 言

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般指的是民营资本,其与国家资本和外国资本处于不同的结构序列。但因为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对经济所起的作用特别大,讲那个时段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能离开政府,所以本书也对政府投资、政府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作了一些讨论,考察政府对经济所起的作用,或者民族资本主义与政府的关系。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止的这10年有时被经济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10年”。1936年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当然,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研究表明,这1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市场为主,政府所起作用有限;后期主要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波及中国,国民政府的作用凸显,在“统制经济”和“发达国家资本,限制私人资本”的口号下,大力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府成为投资的最大主体,并对经济实施力度越来越大的控制。根据本书作者的研究,全面抗战前10年的中国经济出现过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36年。1931年的发展高峰是市场主导的结果,而1936年的高峰则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本书尽可能多地从侧面展示和论述这1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结构变化、政府政策、金融业变迁、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还缺少很多内容,如农业、在华外资等,有的手头正在做,留待以后出书时补充。

本书收录本人的共19篇专题论文,其中15篇发表过,4篇未发表过。对于发表过的论文,在此次收录时,可能会在个别地方对统计数字作勘误,也或在个

别地方加注说明,表明作者当前的认识,但这类改动是很少的。本书引用的前人的统计表格数据,其合计数、比例或指数等,经核算,多处有误差,但我们不能更改前人的历史数据,只能姑且存之;如果出入较大,则在注释中说明。

书后的附录是 1928—1937 年的新设企业统计。我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书后的附录截止于 1927 年的新设企业统计,因为那个统计包含了 1927 年,所以本书附录的新设企业统计从 1928 年开始,避免 1927 年出现重复。本书的统计是以前那个统计的接续。

对于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过去出过许多质量很高的资料书,对学科建设非常重要,对研究者非常有用,其意义远远超过质量平庸的研究性著作。但现在很少有人致力于此,因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考核办法不利于人们去做这些基础工作,但愿这种状况在今后会有所改变。

做新设企业统计是我的老师汪敬虞先生在我读博期间要求我做的,当时还送了我一个木质有盖的卡片盒。我一直把这个卡片盒珍藏至今,看到这个卡片盒,就想起老师对我的要求和期待。1988 年的时候,我做的企业统计是包括 1928—1937 年这 10 年在内的。汪老师认为这 10 年的资料非常多,一时半会儿可能缺漏会比较多,没有把握,所以建议我把这 10 年的统计先搁一下。事实证明汪老师的感觉是非常正确的,我这次整理的企业数字与 1988 年的整理相比,大约增加了 200 多条之多。但即便是对于经过增补的统计,我仍不能说已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说是相对的改进,可能还是会发现许多遗漏。我们对统计数字要心存敬畏,尊重数字,而不是做数字游戏。这是老师对我的教诲。

这本书中有两三个地方用了计量方法,这是我“六十岁学吹打”学的,水平低是当然的了,权当我向方家求教。现在经济史学界关于计量方法的使用,意见分歧。我的看法是大可不必统一,各种批评意见可以作为各自发展的镜子。我粗浅的意见是:计量方法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何处用、如何用。使用计量方法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数据的可靠性问题和计量方法的合适性问题。大家都在说,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可以成为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拿来就用,有些经济学模型,特别是宏观的,如凯恩斯模型,是否适合用在近代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可能还属于起飞前的阶段,是需要证明的。

这种理论证明的功力应该远远高过技术性功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留待以后另行著文讨论。就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农村经济而言,靠谱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都不易得到。找到和整理这些数据的功力也要远远高过技术性功力。至于计量方法的合适性,相信不应该由我这样的粗浅者来说。

希望大家对本书的缺陷提出意见,以便改正。

作者于 2018 年 1 月

# 目 录

总序/1

前言/1

## 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与经济政策

1928—1937年中国的新设企业与政府投资/3

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实现途径/29

1937年前国民政府的民生措施及其局限/47

1937年前国民政府扶持经济的若干政策及措施/64

国民政府在经济萧条期的增税、减免税及补贴措施/81

## 中国金融业

1937年前省市立银行的扩张/99

近代中国的政府公债与金融市场/113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125

近代以来沪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143

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

——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154

## 市场与 GDP

收入、游资与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175

市场的定义与 1933 年 GDP 测算/186

## 经济结构转型

1937 年前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199

近代中国乡村织布业的历史地位/214

## 企业制度与信用制度

近代中国企业家多元投资效果分析/229

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前的委托代理问题

——以统益纱厂为中心的考察/25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259

## 阶层排序与收入分配

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285

1933 年上海城市阶层收入分配的一个估算/297

附录:历年所设本国企业一览表(1928—1937 年)/307



**国民政府的经济投资  
与经济政策**





## 1928—1937年中国的新设企业与政府投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0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1〕经济史学界认为,1936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一批重要的重化工业企业和新兴产业在1937年前几年内涌现出来。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力度。总结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律、特征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关于全面抗战前10年中国经济的评价普遍持停滞论和萎缩论的观点。近年来多数论者都认为这10年的中国经济是有发展的,但也有一些论者并不认同,如刘克祥、吴太昌提出了一个“未老先衰”的概念,认为这一时期(1927—1937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和发育、成长,就过早地进入停滞、衰退、朽变阶段。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未老先衰”。〔2〕有的学者虽认为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是有发展的,但工业投资局限于1931年前。如许涤新、吴承明认为,在1921—1936年间,“工业投资主要在1931年以前”。〔3〕

其实,虽然很多学者断言全面抗战前10年中国经济是增长的,但大多流于用举例子的方法做出判断,真正提出原创性证据的研究并不多。在这方面,有

\* 本文获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1〕 全面抗战前10年,一般是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止。因笔者在《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一书中做的企业统计到1927年底,为避免1927年的局部重叠,本文的新设企业统计从1928年起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止。

〔2〕 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页。

几项早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值得在这里提出来:章长基在其所著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一书中,对 1912—1949 年间中国工业的 15 种主要商品的产量和产值进行了数量分析,计算出 1926—1936 年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3%,1931—1936 年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9.3%,增长的势头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 1912—1936 年间,“中国经历了几乎不间断的工业扩张,扩张速度也相当快”。〔1〕罗斯基则通过对水泥、钢铁、机械等近代固定资本品投资量的统计,得出全面抗战前 10 年经济增长的结论:根据对水泥、钢铁、机械这三项投资品全国消费量指数的统计,如果以 1933 年为 100 的话,则 1927 年为 57.1,1936 年为 135.2,而且除个别年份略有回调外,基本趋势是稳步上升的。〔2〕刘佛丁等综合了巫宝三等前辈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所得的研究,编制出 1850—1949 年间五个时间点的国民收入数据,其中 1914—1936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1.45%,高于 1887—1914 年的年均增长率 1.00%,而另两个时期(1850—1887 年和 1936—1949 年)则为负值。〔3〕

全面抗战前 10 年的政府投资也是学界关注的领域。1937 年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实施了金融业的政府行政性垄断,这是没有异议的。而在工业方面,过去学界认为战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还是很低的。许涤新、吴承明认为,战前“南京政府还主要是致力于金融垄断,产业投资有限”,“真正的工业垄断,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辅以日本赔偿和归还物资,才完成的。这无异于日本资本的让渡”。〔4〕罗斯基认为,战前“中国政府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仍很有限”,“中国政府历来很少干预工业发展的进程,而且缺乏系统的规划”。〔5〕

研究全面抗战前中国经济可以有多种视角,如上文说到的商品的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国民收入总量等,本文拟以 1928—1937 年的新设企业为视角,提供新设企业的统计成果。又因为新设企业的统计中包含政府投资企业的统计,

〔1〕 章长基的统计和基本结论可见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9—325 页。

〔2〕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唐巧天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6 页。

〔3〕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6 页。

〔4〕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 卷,第 13、728 页。

〔5〕 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第 79 页。

这使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政府对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企业的投资有一个基本的、较为全面的数量概念。

### 一、新设企业的统计

新设企业的统计是诸多重要的基本经济统计之一。美国学者内森·罗森堡和L.E.小伯泽尔认为,新设企业“在革新发展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在欧美、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迅速扩展,“并不是老企业新设分支机构,而是新企业的不断创建”,“它们不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持续给老企业施压,也间接地刺激了经济的成长”。〔1〕20多年前,笔者在孙毓棠、汪敬虞两位前辈的两部工业史资料的新设企业统计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修订,做过1840—1927年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的统计。其实在做这个统计的时候,是把时限放到1937年的,因对1928—1937年的积累是否完整没有把握,所以当时没有把这段时间的材料一并拿出来发表。通过编制历年新设企业一览表,然后在一览表的基础上进行新设企业统计,可以使这一统计更有依据、更为可信。〔2〕

2012年夏天,笔者在查阅《实业公报》时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实业公报》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办的周报,从1931年5月起开辟有“注册公告”专栏,实业部要求凡公司制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等)都必须向实业部注册登记,虽然注册日期与实际设立日期可能不一致,但经过对《实业公报》上注册公告企业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及与其他资料来源比照,应该说公司制企业就较少会被遗漏掉了。《实业公报》上还有“商业注册”、“工厂注册”等其他注册资料。工厂注册与公司注册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但工厂注册的公告资料不完整,如没有资本额,很难判断企业规模的大小。商业注册是一种自愿注册,更多反映中小企业的活跃状况,归纳整理后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非公司制企业则仍可能被遗漏掉,如上海地区很有势力的汇兑大钱庄因为是合

〔1〕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曾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221页。

〔2〕以往大家在做中国近代企业的统计时,一般都只是引用历史上的统计数字,因此常会出现漏缺较多、内涵不清等问题。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18页)在做全面抗日战争前10年新设企业统计时仅引用了1936年度《申报年鉴》的数字,但这个统计只到1934年6月止,此后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的数据都是空缺的;仅有注册公司的家数而不知其结构如何,而且企业资本也不知道是额定资本还是实收资本。

伙制企业,无一家注册登记,而由山西票号改组而成的一些山西银号,因为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所以都做了登记。

笔者所做的 1928—1937 年新设企业一览表因篇幅太大,无法作为本文的附录呈献给读者,仅将一些自定的规则交代如下:

1. 本表是《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sup>[1]</sup>附录企业一览表的接续和延伸,除下文特别说明外,本表的制定原则和工业行业的分类标准也基本与上述著作相同,以便研究者在需要时建立时间序列数据。

2. 本表的统计除包含上述著作企业一览表的业种之外,还列入 1931—1936 年间在《实业公报》上公告的、以公司组织注册的、包括房地产业和转运业等在内的各种商业服务类型的企业(见表 4)。另外,原来的航运业在现在的统计中改为交通运输业,包括商办铁路、航空、航运和公路长途运输在内。

3. 《实业公报》上发布的时间是企业的注册时间,而不是其设立时间,在编制本表的过程中,已根据其他相关资料作了一定的考订,但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能够提出宝贵意见,今后加以改正。另外,许多企业筹建时间颇长,往往会跨几个年份,本表尽可能以开始筹建的年份算起。

4. 列入本表的工矿、交通运输企业系创办资本额在 1 万元以上者。

5. 列入本表的新式金融企业系创办资本额在 5 万元以上者,而钱庄、银号等其他类的金融机构的创办资本额在 3 万元以上并以公司制企业向当局注册者,典当资本则在 1 万元以上并以公司制企业向当局注册者。

6. 列入本表的房地产企业、转运和各种商业服务类型的公司企业,一律以注册公告为准,不受资本额是否达到 1 万元的限制。

7. 因有些业种在这阶段可能新设企业很少,而新的业种也可能生成,所以在业种分类上会与《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的附录统计表略有不同。

8. 凡确知创办实收资本的,以实收资本额列入,有些企业则难以区分额定资本和实收资本,还有些企业缺乏创办资本数字,其资本额可能是设立一段时间后的数字。

9. 资本额不详但依据其他史实推断其资本额达到或超过以上限额者,也列入表内。

---

[1]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